

## 清政府六省裁漕的目的

杨天宏

咸、同时期，正当太平军与清军逐鹿江南、胜负未卜之际，清政府的一些地方官吏奏准朝廷，先后在湘、鄂、赣、皖、苏、浙六省，分别情形，裁减钱漕浮收与正额。为什么戎马倥偬之际，清政府会出此一招？其目的何在？有学者认为，清政府六省裁漕，在于设法“调动六省地主阶级的财力，达到军事上镇压革命的目的”；认为裁漕是“地主阶级政权向农民政权反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意见虽不无道理，但却有些以偏概全，不能尽然揭示事物的底蕴。本文试图从以曾国藩为首的地主阶级经世派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以及实施这种思想主张的政治条件等角度，重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六省裁漕是对既有漕政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清厘与改革。因此，欲论六省裁漕的目的，首先应对漕政的弊害有所了解。清代中叶以前，漕弊并不突出。史籍上所谓“国朝轻徭薄赋，屡沛恩纶，（民）久已出水火而登衽席矣”<sup>①</sup>之类说法，虽曰溢美，亦含有信实的成份。这种情况沿及道光，乃发生了明显变化。此时清政府的钱漕正额并无增损，但是，在钱漕的实际征收中，却衍出了愈来愈多的流弊。其危害较著者，有如下三端：

其一，地方官吏浮收勒折。钱漕乃清朝的“天庾正供”，规定各省州县按章征收。然而，因“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sup>②</sup>，故“按章征收者绝

少”<sup>③</sup>。业户完纳钱漕，分“本色”与“折色”两种。若纳“本色”，除公然折扣外，还巧立名目，征收水脚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揀费等项。几番盘剥下来，农民负担“自倍蓰至十百不止”<sup>④</sup>。至若“折色”，浮收之数亦不在少。业户纳钱漕之前，有所谓“由单”，须得缴费；既纳之后，又有“串票”，亦须缴费。此外，再加上以零为整的“收尾”等方式的收刮，“其征收折色，每石折钱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sup>⑤</sup>。浮收勒折之弊，由此可以概见。

其二，书吏差役居间勒索。“利于钱漕之速完者，官也；利于钱漕之多欠者，差也”<sup>⑥</sup>，此语道破了书吏差役借催征钱漕之机中饱私囊的奥秘。清代承办钱漕的差役名目甚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有图差，有保差，有帮办之差，有垫办之差，有上堂代受枷责的假差，此辈“皆指望百姓积欠丁漕以养身者也”<sup>⑦</sup>。他们声息交通，联同一气，以勒索完漕百姓为职业。江苏巡抚丁日昌记载丹阳县的征漕情形时有如下言：

“阳邑离城穹远，及零星小户赴城完纳钱漕，所费不貲，往往就近托里运书科代为完纳。该县闾境科书共有一百八九十人，联同一气，借图侵用，历为常经，皆缘田额推收细册均在伊等之手，传为世业，秘而不宣。虽经州县斥革，而积习相沿，一时势难挽回。”<sup>⑧</sup>丁日昌指斥之人，不唯丹阳，各地

皆有。他们利用承办钱漕之机，采取强索贿赂、包完包抗、截串卖荒等手段欺蒙上司，作贱下民，聚敛财富。清代漕弊，不数端而足，而其为恶最著者，恐当推此。

其三，大户小户之差别。清代业田之家有大小户之分，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两者的钱漕负担亦多寡相异。例如，在浙江，有“绅衿大户，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有把持包揽等事。势不能不取盈于乡曲之小户，以为挹此注彼之谋。……大小户长短不等，最重之户，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斗以上者”<sup>⑨</sup>。在湖北，州县官吏征漕多收取冗费，“州县既多冗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刁民挟制。于是大户折色之价日减，小民折色之价日增”<sup>⑩</sup>。大小户钱漕负担的差异，非浙江、湖北仅有，时人尝明白指出：这种差异“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积弊也”。<sup>⑪</sup>

漕政之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不仅损及广大自耕农和佃农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境遇每况愈下，就连多少能向佃户转嫁损失的中小地主，也不能尽免于难。道光以来史籍多有“大户变小户，小户变贫户”的记载，正如实反映了漕弊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钱漕收入亦大受影响。据统计，清政府对江南六省的额定田赋为每岁一千二百余万两，但是到道光末年，每岁仅能勉强征到八百余万两，仅及定额三分之二。严重的漕弊，将清政府弄到了捉襟见肘、不思改弦更张便难以在经济上安然度日的境地。

于是，早期漕务改良的思想主张应运而生。道光时期，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包世臣、缪梓、汤成烈、冯桂芬等人，对既有钱漕制度下农户“田内所收不敷两税”，以至“乐岁终身苦”的凄惨遭遇深表同情，在揭露漕弊的同时，已初步酝酿成熟了他们“均赋”<sup>⑫</sup>一类改革思想。虽然终道光之

世，他们的思想主张一直被清朝统治者束之高阁，但他们改革漕务的思想主张能够产生这一事实却已说明，革除清代漕政的严重弊害，乃是尔后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吏实施裁漕的重要目的之所在。离开漕政的弊害而讨论裁漕的目的，难免流于空泛，不得要领。

当然，仅仅从漕弊以及早期漕务改革思想主张所由产生的角度，尚不能充分揭示六省裁漕的目的。裁漕运动主持者的思想主张虽然与包、缪、汤、冯诸前驱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时势变迁，后来者的思想较其前驱的思想已有了某些变化。如果不对裁漕主持者的思想动机作一番剖析，将仍然不能揭示六省裁漕的正鹄。江南六省裁漕形式上虽经旨准，实际上却是自下而上展开的。主持裁漕的地方官吏有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些人为学讲求经世致用，思想特征务实，是清朝统治者中新崛起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对清代漕政的弊害均有较清醒的认识并且一直在寻求有以治之之法。例如曾国藩，还在咸丰帝继承大统之初，便上了一道《备陈民间疾苦疏》，将银价太昂、钱漕过重视为百姓一大疾苦。他痛心疾首地诉说道：由于官吏的巧取豪索，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弄得天下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因而在奏疏中提出了“急为更改”<sup>⑬</sup>漕政的建议。胡林翼对漕弊的认识更是入木三分，极为透辟。在担任湖北巡抚时，他曾多次怒斥征收钱漕时“州县用费不足，则以小户之有余，暗为取偿”、大小户钱粮负担差别悬远的弊端为“湖北二百年之虐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积弊”，因而密奏朝廷，吁请尽快革除“漕务积弊”<sup>⑭</sup>，以纾民困。此外，如骆秉章等人，亦痛感漕弊甚深，为恶巨大，“小户穷民，尤受其累”<sup>⑮</sup>，试图

说服朝廷清厘漕政。

曾、胡等人对漕弊深恶痛绝，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跻身社会中下层，多少了解民瘼有关。如曾国藩在未仕之时，“家世微薄”，祖、父两辈充其量算个小地主。曾国藩尝为自己的“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sup>⑥</sup>而抱憾良深。左宗棠在其年轻时，家境亦极为窘迫，他曾经一度穷困到“身无半亩”、被迫入赘妻家的狼狈境地<sup>⑦</sup>。这种起于微贱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在地位改变后，仍然能或多或少保留对社会中下层悲惨遭遇的物伤其类的怜悯与同情。更重要的是，咸、同时期，随着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曾国藩集团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势力，其社会政治地位日益显要，成为清政权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作为这一拔地崛起的政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中小地主阶级，其经济地位并无大的提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匍匐在既有漕弊的重压下艰难地爬行，这与曾国藩等人扶摇直上的政治地位是不相适应的。这种情况，必然使曾国藩等人要“代表失意的地主分子诉苦”，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既然漕弊使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广大业户备受其苦，不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改革漕政也就自然成了曾国藩等人亟亟乎不可须臾等待的事业。可见，六省裁漕的一个重要目的，乃在于改善和提高作为曾国藩集团社会基础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

从思想渊源上分析，曾国藩等人的裁漕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思想尚存在某种继承关系。农本主义的特点在于视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主张实施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培护封建制度的基础。曾国藩等人思想中的农本主义色彩亦极为浓厚。曾国藩实施裁漕时曾说：“今日之州县，（当）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

减役以安其身，……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sup>⑧</sup>胡林翼将这一思想表述得更为明晰，他在一封信中透露裁漕的动机说：“窃尝考古今之迹，治世与乱世不同用，而爱民之心则无不同。……农犹根本也，商犹枝叶也。……宽其意于钱漕，所以培本计而致厚于农民；严其法于厘金，所以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非独苛于商贾也，商逐末取利厚，缙算亦便；农力勤取利微，损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sup>⑨</sup>曾、胡等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姑不具论。所须指出的是，在以农业立国、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本主义必然内涵民本主义。于是，曾、胡等人因起于卑微而自然产生的对社会中下层命运的同情便升华为基于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爱民培本”一类的信条。这样一来，曾、胡等人改革漕务的主张也就在理论上成立并完善化了。而咸、同间江南六省裁漕，不过是为了实践曾、胡等人改良主义经济主张从而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罢了。

当然，探讨主持裁漕者的行为动机，也不能不看到曾、胡之辈有利用裁漕来缓和迫在眉睫的粮饷危机的意图。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道光以来各地零星的抗漕罢漕斗争呈现出与太平天国运动合流的趋势，由单纯经济斗争逐渐转化成旨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抗漕罢漕斗争的升级，使清朝地方官吏无不深感“新漕大为棘手”<sup>⑩</sup>。尽管清政府一再严加督责，地方官吏亦想方设法追比催科，道光以来钱漕收入锐减的势头仍然不能遏止。到咸丰初年，江南六省的钱漕每年只能勉强收到六百余万两，比极不景气的道光末年又减少二百万两，仅及定额之半。

钱漕收入在锐减，而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因对付太平天国的战争而激增，弄得清政府捉襟见肘，一筹莫展。据统计，截止1853

年，各路清军糜餉总额已高达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两，户部库存银仅余二十二万余两。以后，战争规模扩大，太平天国莫都金陵后，迅速开辟了北伐、西征及东取苏杭三大战场，这就更使清政府的军费开支有增无已。以1856年苏、鄂、赣、皖四省兵营所需餉额而言，其总数已高达一千四百余万两，相当于江南六省实征钱漕量的二点三倍。清政府因受漕弊之累，在太平无事的年景已有入不敷出之虞。此时，战争扩大，举国烽火，“部库益形支绌，而各省应征地丁漕粮益关各项，亦多不能征解足额，其被兵省份，更属竭蹶不遑”<sup>④</sup>。收支的巨大矛盾，使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创设厘金、推行捐输捐纳、滥制钱币以及增加关税额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财政收支的矛盾。特别是厘金制度，自1853年创设后，成为清朝营兵和湘军的最重要的财源。但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因此出现大的纾缓，清朝军队的餉项仍然远远供不应求。1856年以后，清军江北大本营出现了“粮台告罄，众兵待哺嗷嗷”<sup>⑤</sup>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急情况。在湘军兵营，平素给养便十分缺乏，兵士严重缺餉，实吃卯粮。此时更出现了“两三月未给餉”，“仅以糜粥度日”<sup>⑥</sup>的困境。据统计，湘军历年兵士欠餉总额达五百余万两。以至身为湖北巡抚的湘军大师胡林翼，亦因“言货则月少十万两之银，言食则一省之大，公家无三五日之粮”而顾影自怜，哀叹自己的处境“与燕雀处堂何异”<sup>⑦</sup>？大师尚且牢骚满腹，兵士就更加怨声载道。于是，更为严重的后果——兵心不固接踵而至。从1857年起，清军发生了多起哗溃事件，其中大多起因于欠餉。在这种情况下，曾、胡、骆、左等人必然要在已有的措施之外，寻求新的办法以图解脱，而裁漕便是他们所找到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自救办法。王闿运分析左宗棠、骆秉章在湖南实施裁漕的动机时曾说：“秉章以军餉不给，始清厘漕粮浮折”<sup>⑧</sup>。王闿运乃局中之人，其分析应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

除了筹措军餉外，曾、胡之輩利用裁漕与太平天国争取民心的意图也颇为明显。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胡等人即敏锐地察觉了这次起义与漕弊的关系，认为欲平定起义，首先应该革除致乱之根。《湘军志》称：“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城，既克省城，则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民困。”<sup>⑨</sup>1856年底，当湖北裁漕行将举行时，胡林翼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颇能说明其争取民心的用意，疏曰：“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夫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经臣驳斥在案；六年大饥，州县转不报灾，经臣驳斥在案。以丰为欠，是病国计；以欠为丰，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寇之再至，而将盗弄于潢池也。”<sup>⑩</sup>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准备裁漕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重。”<sup>⑪</sup>可见，对于民心离异的深切担忧，确实对六省裁漕的实施产生过一定作用。但是，曾国藩等人利用裁漕来筹措军餉并争取民心的用意，应该而且也只能理解为他们改良主义思想主张的组成部分。如果认为只要裁漕主持者有某种针对太平天国的意图，便谈不上什么改革而只能斥之为“地主阶级政权向农民政权反攻的重要步骤”，那么中国历史上也就任何改革都没有了，因为历史上所谓改革者的政治行为，大多带有类似的“反攻倒算”的性质。

至此，尚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既然曾国藩等人很早就酝酿成熟了改革漕政的主张，又为什么偏偏要拖到1857年以后才实施

裁漕呢？要解开这一疑窦，首先应当认识到，裁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清代漕弊为害甚大，但也有不少人从中受益，他们是漕弊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漕政方面的改革都必然遭到他们的反对。包世臣等人的早期漕务改革思想不能付诸实践的原因即在于此。因此，笔者怀疑，六省裁漕发生在1857年以后，除了此时的战争形势有以致之而外，可能还与在这以后曾国藩集团的主要成员才陆续膺任疆寄，实际控制地方政权，从而具备了实施裁漕的政治条件有关。

如众所知，湖南裁漕始于1857年，此时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不久。也正是此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策画，“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sup>②</sup>，左、骆同心协力，湖南的裁漕方得以实施。湖北裁漕，时间是在胡林翼实授鄂抚、以政治手腕扼住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sup>③</sup>之时。曾国藩1860年总督两江，节制四省，次年江西即厉行裁漕，安徽、江苏亦次第举行。左宗棠1862年任浙江巡抚，未及一载浙江亦效尤各省，删减钱漕。这不应看作巧合。湖北开始裁漕后，户部越俎代庖，欲将办法推及苏、浙，胡林翼不愿从命，他在给友人钱蔥生的一封信里表达了他的思虑，信中写道：

#### 注释：

①《湘乡县志》卷3《赋役》，（同治十三年刻本）。

②⑤《骆文忠公奏议》卷12。

③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4。

④《湘潭县志》卷6《赋役》。

⑤⑩《胡文忠公遗集》卷23《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咸丰七年）。

⑥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6，页49。

⑧丁日昌：《抚吴公牍》（同治）卷32。

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

⑪《胡文忠公遗集》卷60《致罗淡村方伯成九》。

“漕折事仍照旧。部中则通行各省，意欲仿照。浙江情形不同，尚须从轻（缓）。江浙州县痼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长官所能铃制。……异日如以骆以涤办江浙督抚之事，均力能及此。非欲迟也，盖有待也。”<sup>⑩</sup>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没有曾国藩、骆秉章这号铁腕人物掌握江浙督抚大权，要剔除那里的漕弊，绝非易事。因此，胡林翼宁愿江浙漕事暂且不办，待曾国藩或骆秉章谋得那里的督抚位置后再说。胡林翼的这番思虑，解开了裁漕运动的时间之谜，并说明了六省裁漕与清朝权力结构变化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江南六省裁漕是掌握清朝地方实权的曾国藩集团改良主义政治经济主张的一次实践。裁漕的目的固然有针对太平天国的一面，但这方面因素并不突出。改革漕政是曾、胡等人一贯的思想主张，这一主张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前已酝酿成熟，即使不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政治权力，曾、胡等人改革漕政的动机亦足以导致裁漕运动的展开。因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这样做，要维护曾国藩集团的既得利益，提高他们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需要这样做。

⑫参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6，《致前大司马许太常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4，汤成烈：《治赋篇》；缪梓：《缪武烈公遗集》卷1，《拟改银币折钱疏稿》一；冯桂芬：《显志堂稿》卷9，《均赋劝绅说》。

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

⑭《胡文忠公全集》卷3，《抚鄂书牍》（一），致罗淡村方伯。

⑮《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

⑯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1。

⑰《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3，《劝诫州县四条》。

⑱同注⑮、《致陈秋门给谏》。

察人物内心的能力。我们看到了一个痛苦的灵魂，看到一个因幻灭而引起迷惘和绝望的心。那没有写出的地方，就是一个无限的空间，读者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别林斯基说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时指出：“仅用一个特征，一句话，就能够把任你写上十来本书也无法表现的东西生动而充分地表现出来。”<sup>⑦</sup>不仅如此，作家写腓特力“在雨中走向旅馆”时，便嘎然而住，结束全书，使那已造成悲剧气氛的感情惯性继续运动，收到言尽而情无限的艺术效果。这比菲茨杰拉德的写法似乎更胜一筹。

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的确富有魅力，

#### 注释：

①②马尔科姆·考利，《福克纳评论集》。

③《西线无战事》后记，外国文学出版社。

④本文小说引文分别引自《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菲茨杰拉德小说选》、《一位女士的画像》，人民文学出版社。

⑤《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版，1959年。

⑥《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文艺版，1963年。

⑦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⑧罗曼·罗兰：《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

也可以看到构成他的魅力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英国作家欧·贝茨说，海明威的作品后面，“有一种出于个性，别人永远无从效法的节奏，有一种本人独具的节奏，个人内心的悲郁，对于死的深沉的忧惧。”<sup>⑧</sup>这些东西，构成了海明威的思想特质和艺术特质，而这种特质又渗透到他的作品之中，与它们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模仿者可悲的地方就在这里。世界上，艺术的魅力永远不会相同，否则就不会有自己的光彩，真正的魅力产生于作家独特的气质之中，海明威是这样，福克纳也是这样。

⑨巴里耶夫斯基《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

⑩同上。

⑪马尔科姆·考利《海明威，这头老狮子》，《世界文学》1979·1期。

⑫同上。

⑬詹姆斯：《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

⑭同⑤。

⑮赫·欧·贝茨《现代短篇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

⑯同⑥。

⑰同⑮。

#### （上接第58页）

⑱《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9，《国用》。

⑲⑳何良栋编：《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卷18，页18—25。

㉑《胡文忠公全集》卷3《抚鄂书牍》（一），《致严渭春观察》。

㉒㉓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㉔㉕同注㉖《湖北篇第三》。

㉖《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复郭意城》。

㉗同注㉘《致钱蔣枢密》。

㉘《吴煦档案选编》四，页27。